

上海咨询信息 (月刊)

2013 年第 8 期
(总第 313 期)

主 办：上海市咨询业行业
协会

印 刷：上海欧阳印刷厂
有限公司

目 次

- 协会工作 •
 - 协会召开“发放咨询资质证书”讨论会
.....常 成 郭德利 (2)
- 咨询专论 •
 - 对“上海自贸区获批”的解读李小钢 (2)
 - 资本市场将决定中国转型成败祁 斌 (4)
 - 为什么中国的体制改起来特别难?周其仁 (8)
 - 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五大方法
..... Jonathan House (11)
- 专家观点 •
 - “克强经济学”更多的是强调改革和稳增长夏 斌 (13)
 - 放弃投资是“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主张
.....林毅夫 (14)
 - 中国经济增长不能靠消费黄育川 (16)
 - 美国政府为何不救底特律破产许一力 (17)
- 咨询专家风采 •
 - 协会咨询专家陆雷作为首批上海市新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到
政府部门挂职锻炼唐 勇 (19)
- 聚焦中国 •
 - 中国建筑资产总值全球第二 (20)
 - 上海明确深化改革开放三大工作重点 (21)
- 世界瞭望 •
 - 美国纽约港自由贸易区 21 条优惠政策 (22)
- 政策解读 •
 - “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解读
..... (23)
- 封二 •
 - 万隆国际咨询集团有限公司简介

· 协会工作 ·

协会召开“发放咨询资质证书”讨论会

为更加方便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各咨询企业的工作,经过前期的酝酿筹划,协会就发放“咨询资质证书”与管理办法听取意见。2013年7月15日,协会于上海市科学会堂2号楼2311室召开讨论会。协会副会长汪天翔、协会副秘书长郭德利、万隆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陆雷、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副主任范习友、企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MT)副总经理邱兢、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造价咨询中心办公室主任周琪等九位会员单位的领导和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就为什么要对咨询企业进行咨询资质证书的发放和如何对咨询资质证书进行管理进行讨论。会议认为,咨询资质证书能够体现咨询企业在咨询行业中所具备的相应能力,对提高会员单位在行业中的影响力及积极性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各会员单位就咨询资质证书的发放及管理方法,在会议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经过会议讨论,形成了以下共识: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的会员单位可以向协会申领咨询资质证书;协会尽快出台“咨询资质证书的发放与管理办法”,组织资格审查委员会,对申请咨

询资质证书的咨询单位进行资格审定,最后提交协会理事会通过。资格审查委员会由协会领导和各专业委员会领导共同组成;获得咨询资质证书的企业将在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网站上进行公告;“咨询资质证书的发放与管理办法”将向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报备并接受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监督。

与会代表还提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显现跨界交叉的趋势,若咨询业范围按传统的方式划分,有挂一漏万的可能。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需要修改传统的咨询业服务范围,为其设置较为宽泛的发展空间。结合以往咨询企业的分类,如将咨询企业的服务范围修改为:区域经济咨询和产业经济咨询、项目咨询和产品发展咨询、专业咨询服务。其中项目咨询包括工程咨询服务及科技咨询服务。

会议希望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需尽快颁发咨询资质证书,满足咨询企业在招投标过程中资质证明的需求。

(常成 郭德利)

· 咨询专论 ·

对“上海自贸区获批”的解读

上海社会科学院外国投资研究中心主任 李小钢

2013年7月5日《金融时报》以“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将释放更多改革开放红利”为题,报道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7月3日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会议强调,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建设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这是新一届政府在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实施积极主动对外开放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要求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一、“上海自贸区获批”的背景：

新一届政府组建后，新任总理李克强提出了创新发展的一系列理念，其中，有三个需要引起关注，也是上海自贸区经过两年多时间准备缓慢推进如今突然提速获批的重要背景。

一是改革是最大的红利。通过行政改革（含打破行政垄断）来激活社会经济，使之成为新一轮发展的原动力。一系列的行政审批和管理改革已经和正在快速推进中。

二是从改革开放到开放改革。前三十年的提法是改革开放，即：先改革（国内制度）后开放，以改革促开放。现在的提法是开放改革，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转型（李克强：5月23日在瑞士《新苏黎世报》发表题为《为什么选择瑞士》）。其实质，就是借助外部能力来推动国家的新一轮改革。

三是经济发展升级版。其本质就是发展服务经济，服务经济就是以人力资本为主要生产要素形成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和社会形态。自贸区在服务经济发展方面会有突破，尤其是一些重点领域和行业，如金融、教育、卫生、税改等会借助境内关外环境进行先行先试。

李克强3月底的苏沪调研：“主要有三层意思：第一，经济全球化大调整目前看来是绕不过去的，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第二，唯有用开放来倒逼改革，改革中存在巨大的发展红利；第三，这一轮开放不是单纯地招商引资，而是改革投资体制，要找一个地区来先行先试，这个地区应该是有条件、能试得好、不会闯祸、有经验并且有影响力的地方。”

二、“上海自贸区获批”的定位：

一是国家层面的示范和测试。这次批准的上

海自贸区的名称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其中，中国两个字非常重要。这表明上海自贸区的定位获得提升（原先的方案是小打小闹的建设总体方案，关注的是平台而现在更关注的是内容）。

二是应对后WTO时代的全球化。后WTO时代，全球投资、贸易一体化的趋势愈加明显，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都在加快推进中，其开放的内容更加广泛，并广泛采用“负面清单”模式，除了包含在保留清单中的领域外，其他的均属开放，并且新的服务部门被自动地纳入到该协定下。上海自贸区是主动开放的一项尝试。

三是可以复制。名称叫“试验区”，内容文字中提及可以复制，表明上海自贸区是中国新一轮开放的先期实验和测试，一旦成功及可控，便会复制和梯度推进，如同早期中国对外开放的步骤先“点”（4个特区）、后“线”（沿海14市）、再后是“省会城市”。

四是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除了传统自由港概念外，自贸区应该会重点推进服务产业的对外开放，重点包括：教育、医疗、金融、商贸等（李克强：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和空间，特别是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

五是管理制度转变。除了少量需要事先审批外，大部分的产业准入将完全开放，对外资而言，除了个别专项，大部分的行业有可能普遍采用登记制或注册制，省去了审批环节。政府职能将发生重大转变。

三、“上海自贸区获批”的细节：

最终的方案文本没有看到，但从媒体的报道和初期提出时的设想汇总推断，对上海自贸区规划的细节作出如下推断：

1、主要是部门自我开放的探索，而且，是自上而下的开放、放权，而非逆向。实际上就是负面清单方式的尝试；

2、批准的规划是原则性的，实施过程中，可以动态地调整和不断追加开放内容和产业。上

海需要在实施过程中制定细则，特别是涉及的重点开放产业 / 行业需要进一步的整理和细化；

3、三区四点合一的空间布局，预示着自贸区应该是开放式的，管理的模式最可能的是电子 / 网络围网，而非物理围网。

4、最终方案应该比上海早期上报的方案更加全面。因为，原来是上海向北京争取，而今年三月底李克强总理访问江苏、上海后情况发生转变，是上海配合北京，北京催促上海提交具体方案。因此，涉及的产业和行业内容应该会更多。

5、方案具体内容准备不足，所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通过的是原则方案，具体的内容还将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估计，年底会出台一个操作细则，其中大部分开放内容将罗列其中。

补充一点定义：自贸区和自贸协定

1、自由贸易协定（FTA）

商务部官员对自由贸易区的定义：

自由贸易区一般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

家（地区）通过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对于原产于成员方的货物给予免除关税和数量限制的待遇，但各成员方仍保持独立的对第三方的关税政策，实现成员方之间自由贸易的一种区域一体化形式。发展到现在，自由贸易区已经开始涵盖取消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改善市场准入条件、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等广泛领域，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2、自由贸易园区（FTZ）

根据《京都公约》，自由贸易园区是指一国的部分领土，在这部分领土内运入的任何货物就进口关税及其他各税而言，被认为在关境以外，并免于实施惯常的海关监管制度。而这次批准的上海自由贸易区就是属于自由贸易园区（FTZ），它不涉及特定的区域和国家对象，是中国实施主动的自我开放。这种模式将会对双边或多边的自贸协定（FTA）模式产生什么后续影响需要另外作出研判。

资本市场将决定中国转型成败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证券期货研究院执行院长 祁斌

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最为关键的十年。

2010年，中国经济突破了人均GDP 4000美元，如果按照“十二五”规划的目标，经济保持7%的增长率，十年复利，翻一番，2020年前后，人均GDP将超过8000美元，假设人民币升值10% -20%，就超过一万美元。

这对中国意味着两件事：第一，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意味着中国已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什么叫“突破中等收入陷阱”？2012年，

我有机会去吉隆坡参加了一次国际会议，对此有了一点切身体会。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有诸多不稳定因素，首先它汇集了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其次它汇聚了三大民族：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尤其马来人和华人的矛盾由来已久，历史上也有过一些不快。马来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拥有财富却不到20%，但占据了所有党政要位；华人人口不多，却拥有了财富的80%，但被排除在公职和公共教育系统之外。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你到街上一看，却发现什么事都没有，为什么？2012年底，马来西亚的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达到10304美元，即所谓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

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如果社会发生动荡，每个人都会有所失去，老百姓不会轻易上街了，人毕竟主要是经济动物。

如果中国在2020年前后突破人均GDP一万美元，国家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阶段，社会将有更深的缓冲区，更大的承受力，我们将有机会推动一些更深层次的改革。

第二，如果中国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就大致达到美国水平的四分之一，而中国人口正好是美国的四倍，也就是说，中国有望在2020年前后，经济总量赶上或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尽管我们在很多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但在国际事务和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区域争端中，话语权会增加很多。那时候我们再提共同开发，一些国家可能就会愿意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判。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未来十年，保持增长，保持稳定，加快转型，是第一要务。在增长、通胀和转型之间寻找良好的平衡，是最大的挑战。

怎样加快中国经济的转型？历史经验表明，一国经济能否转型成功，往往取决于其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下。作为经济社会最重要的资源配置场所，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改革，可以成为中国经济转型重要的突破口。

以资本市场改革作为经济转型突破口

资本市场对于经济转型的推动，至少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存量的整合，二是增量的发现。

第一，现有产业的整合。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有很多产业从极端落后起步，成长到了全球屈指可数的地位，最典型的是钢铁

中国钢铁产业已连续多年雄踞全球之首。回想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们“超英赶美”的未已雄心，确实令人感慨万千。但是同样令人感慨的是我们钢铁产业的落后和分散。我国钢铁企业有800家之多。按前四大钢铁企业在行业中占有市场份额的集中度指标CR4来比较，欧盟为90%，美国为53%，日本为75%，韩国为89%，俄罗斯为78%，而我国不到30%。高度分散化带来了诸

多问题。首先是环境问题，据称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是石家庄，这与华北地区的大量中小钢厂不无关系。特别是很多低端钢厂，没有足够的资金和利润空间去提高技术或处理污染。其次，我们每年进口钢材的平均价格是出口钢材的150%左右，为什么？因为我们进口的都是特种钢，出口的都是粗钢。还有，我们每年消耗全球60%左右的铁矿石，却在每一轮铁矿石谈判中都败走麦城，为什么？因为我们2000多家钢厂自己和自己打得不可开交。

钢铁产业折射了中国很多产业问题：产能过剩、过度分散化、没有规模效应、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等。没有产业的整合，就不可能实现企业和行业的升级转型，也就不可能解决好环境和污染的问题。所以我们亟需对这些产业进行一定的整合。

问题是应该怎样去整合？

打造中国的通用和杜邦

历史是最好的教材。美国类似的重工业化阶段发生在1900年前后的30年。当时美国有个人叫卡耐基，号称“钢铁大王”。他的钢铁公司的产量已经超过了当时仍被称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全国的钢铁产量。来自华尔街的JP·摩根告诉卡耐基说，你的工厂办得很不错，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规模太小。卡耐基听糊涂了，说可我已经超过了“日不落帝国”。摩根讲了一句卡耐基想都不敢想的话，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历史。摩根说，我要把你的工厂买下来，还要把美国其他几个最大的钢铁公司都买下来，把你们整合在一起。一年之内他做到了，他组织了一个财团，前后收购了数百家钢铁公司，整合成美国钢铁集团，资本金为美国联邦政府该年预算的2.75倍，一举奠定了美国钢铁产业在全球的绝对垄断地位和谈判力。

在同一个时代，美国几乎所有的重要产业都依托资本市场发生了大量并购。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收购兼并的中小炼油厂多达400家。汽车行业出现了通用汽车，电器行业出现了通用电器，化工行业出现了杜邦公司。资本的力量整合

了美国经济，使之登上一个新的台阶，成功完成了重工业化过程，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同时帮助美国经济完成了从农业经济和以小作坊为主的小工业经济向重工业化经济的转型。

处在重工业化阶段的今天的中国，也应该擅用资本的力量，用并购的手段整合盘活中国经济的存量，加速重工业化进程，这也是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

硅谷奇迹背后的资本

美国经济的最新一次重要转型，即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也与资本市场息息相关。

每次到硅谷，你都会感叹，这是一个众星云集的山谷。在中国古代，村里有人考上进士，大家会说这个村里有“文曲星下凡”，硅谷有一点像很多文曲星正好下凡到了同一个村里，一定是这地方有什么东西非常特殊。是什么呢？是一套机制上的优势，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30英里规则”：在硅谷狭长的30英里的山谷之内，每一个风险投资家都可以找到他想投资的所有技术，每一个创业者都可以找到至少一笔风险投资。有这么一个机制的优势，硅谷就迅速地崛起了，高科技公司如雨后春笋，几十年经久不衰，而且每一轮新的高技术浪潮又都发生在硅谷。

我们知道，美国垄断了上世纪最后30年几乎所有的高科技产业——PC、电信、互联网，生物制药等等。这使得美国经济实现了从制造业为主向高科技产业为引领的创新经济时代。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了所有国家一个机会，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再出发，竞争战略性新兴产业。但是三年后，美国冒出来两个东西，一个叫做iPhone，一个叫Facebook。iPhone横空出世，逼退了手机行业之前的老大诺基亚。2009年苹果股价70美元，当时已经是一个世界级企业，3年后估价超过600美元，市值翻了10倍，我们还是要惊叹资本市场的资源动员能力。而Facebook一上市，我们发现社交网络能够成为一个新兴产业，这大概是所有人不敢想象的，这又是资本市场推动发展起来的。

可以看到，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次转型，都与资本市场息息相关，这并不偶然。经济转型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工程，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下，无疑是决定转型成败的关键。而从长期来看，资本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远远超越任何其他方式。

无锡尚德之殇

过去几年中，中国国内最热闹的一个产业叫光伏，近期的代表性事件，是世界上最大的光伏企业无锡尚德的破产重组。施正荣花了五年时间成为中国首富，又花了五年时间沦为赤贫。这个不幸的事实再次提醒我们，高科技产业的轮换速度是惊人的。我们究竟应该依靠什么去寻找未来的新兴产业？

也许我们应该承认自己的局限性，面对不可知的未来，面对快速变化的高科技产业，我们应该更多地去依靠市场无形的手，而不是依靠“有形的手”去规划或指定行业。过去几年中，大量地方政府热衷于推动光伏企业在当地的发展，如今这一行业却面临大规模亏损，或等待政策的救援。这是“有形的手”过度干预微观经济决策造成的社会浪费的最新例证。

也许“有形的手”的作用，不是直接下河捞鱼，而是退而结网，去引进风险投资、引进金融机构、引进科技人才，创造它们相互融合的平台。也就是说，政府的着力点应该是培育市场力量，提高市场效率，尤其是资本市场，让“无形的手”来筛选和发现战略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这样不仅能让经得起市场检验的真正优秀的产业脱颖而出，而且即使有失误或损失，也将是局部的，能够被市场消化。

为何日本通产省与美国128高速公路都不敌硅谷？

有没有其他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就国与国的竞争而言，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曾经一度非常接近美国，甚至大有要超过美国的趋势，搞得美国人很是紧张。但日本很快凋谢了，其中的原因很多。在高科技方面，日本做了很多带有行政色彩的努力，通产省常年做“战略新兴产业

规划”，做了30年，新兴产业几乎全部错过。今天，日本在高科技产业方面依然是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地模仿。

在美国本土之内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区域竞争，那就是128公路工业园区与硅谷之争。128公路工业园区在波士顿地区，依托于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哈佛大学，而硅谷依托于斯坦福和伯克利大学。应该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科技研究方面，麻省理工和哈佛的实力远逊于斯坦福和伯克利。128公路旁边的工业园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因接受美国军方的订单而兴起，后也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电子工业中心，但其在高科技领域的成就和影响力，与硅谷相比始终无法望其项背。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都在哈佛念书，却都不远千里到西部创业，为什么？因为西部的风险投资比较活跃，资本和科技的结合机制比较自由，创业气氛也因之而比较热烈。

金融结构与经济弹性高度相关

我们也可以检验一下历史，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金融结构，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比较有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位经济学家，曾在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统计了过去50年间，全球17个经济体，在大大小小84次经济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的情况。结果发现，资本市场主导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4个国家，在危机后经济反弹的速度最快，而银行主导的西班牙、奥地利、葡萄牙、比利时、德国、意大利6个国家，经济复苏的速度最慢，其中的几个国家也正是今天欧债危机的主要成员国，说明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弹性是高度相关的。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欧日经济复苏的差异，再次验证了这一点。过去三年中，位于危机中心的美国经济已经基本复苏，道琼斯指数创了历史新高，美国的制造业和房地产全面复苏，失业率也处在历史低位，而且涌现出苹果和脸谱所代表的新兴产业。而远隔大西洋的欧元区经济却深陷欧债危机的深渊，无望复苏；远隔太平洋的日本经济也非常疲软，近期靠安倍经济学打了一针强心剂，长期效果还有待观察。为什么美国经

济的复苏速度远远超过了欧盟和日本？其根本的区别在于两种经济和金融体制的弹性、对风险的化解能力和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同。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差别可以借用李鸿章在甲午海战后的一句话来理解，“日本船小好调头，中国船大难掉头”。在资本市场上，做决策的主体比较小，比较分散，决策快，在危机之中，即使危机没有完全过去，看到经济中新的增长点，他们也可以迅速跟进。我们看到，苹果的崛起正是发生在金融危机之后的三年中。而银行往往由于过于庞大，决策机制较慢，会错过很多机遇，因此，危机后复苏的步伐相对较慢。这说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金融结构，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弹性、对应对危机和恢复增长的推动力，是相对有利的。所以我们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方向应该非常明确，应该进一步市场化，让更多的金融资源通过市场配置，更快地发展资本市场。

中国的“两个堰塞湖”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经济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现象，我们把它称为中国经济的“两个堰塞湖”。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GDP增长140多倍，而总储蓄余额增长了1900多倍。巨大的财富积累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财富多了找不到地方投资，就会不断出现炒房、炒矿、炒棉花等各种怪现象。国内炒不够还要去国外炒，据说炒得澳大利亚人买不起房子了，去年澳大利亚政府出了一个限购令，专门针对中国人，这个限购令比较粗暴，第一是罚款，第二是坐牢。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怎样让这些社会富余的资金回流社会，支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这些资金本身也需要保值增值。所以中国经济的第一个堰塞湖就是资金的堰塞湖。

中国社会还有一个堰塞湖叫企业堰塞湖。中国的中小企业家数超过了1000万家，浙江销售过亿的企业约1万家，中关村科技企业达到上市财务标准的是1000家，证监会门口排队的是800家。我们也想研究一下别的国家是怎么解决类似问题的，例如俄罗斯、巴西，发现人家没有这么多的企业要上市，也没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吃苦去

创业办公司。

人类社会大概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个国家，第一是人多，13亿；第二是恨不得每个人都要办公司，有时要办好几个。我们碰到一些企业家，名片正反两面都印满了，还没有把他们的公司印完；第三是现在都搞明白了，办一个公司就要上市。

怎样才能“高峡出平湖”

应该说，财富的积累和创业的唤醒，这两件事都是幸事，是中国社会得以不断前进的动力，但却分别形成了两大堰塞湖，成为了悬在我们头顶达摩克里斯之剑，孕育着极大的社会风险。为什么？因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的不发达，使得这两者无法对接。而如果我们能够打通它们，哪怕是部分打通，“高峡出平湖”，释放出来的生产力可以不低于包产到户，足以能够使中国顺利走过未来十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通的过程，就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建设过程，而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工程。

现在温州金改是个热门话题。这个城市是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但是中国的中小企业倒闭潮也始于温州，为什么？缺钱。这就很荒唐了。一方面大量的企业需要融资；另外一方面，大量的温州资金满天飞，到山西去炒煤，到新疆去

炒棉花，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投机。根源在于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

温州是中国的缩影。温州金改是一个城市的改革，但它折射了中国金融未来的三大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我们要从一个间接融资绝对主导的金融体系，转向一个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平衡的发展模式；第二个转变是要从大一统的自上而下的金融发展模式，走向地方金融市场有一定自我生长发展空间的模式；第三个就是从以国有金融机构绝对主导，走向国有金融机构和民营金融机构共同发展壮大的发展模式。

应该说，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成败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支点。如果仍然高度依赖传统商业银行的支持，或者过多依赖行政之手去推动转型，中国将不断出现光伏产业这样的案例，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浪费，也会极大地延缓转型的进程，甚至会导致转型失败。

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最有效的方法，是合理布局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更多地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来盘活存量和发展增量。当然市场本身并不完美，所以我们也需要用有形的手去推动改革，加强监管，完善市场架构，提高市场效率，弥补市场缺陷，确保转型的成功。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为什么中国的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周其仁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

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为什么中国的体制改起来特别难？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这里有不少感慨。不是吗？中国这个要改革的体

制，从1952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到1978年，总共也不过就是26年。其实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元素还在，农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劳动者私产的合作社，在理论上还可以退社。农户自留地的面积蛮大的，此外尚没有搞政社合一，没有城乡户籍控制，也没有从这个产业到那个产业，这不准、那不准的那一套。

换句话说，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体制，应该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形成的。总计20年时间，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体制。从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经35年了，人们还在呼吁改革、讨论改革、建言改革。这么一个现象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为什么我们过去形成的那套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现在一个认识是，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改革以来国民经济壮大了多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壮大了。现在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多少亿、多少亿实实在在的利益的。即得利益很大、很顽固，于是改革就难了。

但是，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一套体制就是一个即得利益格局，从来如此。改革要改游戏规则，也就是要改变经济竞争的输赢准则。游戏规则改了，原先的赢家不一定继续赢，当然不可能高高兴兴就退出比赛，总还想维系老规则，继续赢下去。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所以要问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显得特别严重？

我的看法，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它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市场里是出现过一些大公司，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完全靠“看得见之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那还是要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国家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谁能随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义”的大词汇，碰不得，只好拖来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要是意图老是实现不了，不妨考虑改一改方法吧。但是“大词汇”当头，点点滴滴改进的难度骤然变大，一静一动之间好像都触犯了制度底线，既得利益就变得很僵硬。

推进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也就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的理想要坚持，但究竟怎么在中国一步一步实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也要根据实践效果来调整。

其实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互相比赛一件事情，那就是纠错能力。哪有不出错的制度？资本主义了不起，《共产党宣言》说它创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时代的革命性的经济成就，但为什么老要闹经济危机呢？还不是那个体制会出错？过去以为搞了计划经济就可以消除了危机，实际上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中国，经济决策同样也会出错，否则为什么隔几年就来一次“调整”？经验证明，出错不可免，问题是纠错能力强不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优点，但前提是决策要对。决策错，又集中，那错误也大，且纠错比较困难。

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就自动变强了吗？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有一种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再也无需改革，行不行？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大体有三个层面。

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浏览最近新闻，这么大个国家，总有负面新闻，也总有偶发因素、纯个人的因素。不过个人

感受，这些新闻事件还是反映出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社会机体里，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中国是比过去富了很多，但富得不很健康，到处可见富态，也可见病态。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钱数目巨大，本身就够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抢银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利用职权”能带出如此数目巨大的非法收益，不能不判定现行的职权利用体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生生不息，没完没了。

一个国家粮库，一次过火面积就是几万吨存粮。网上议论，向着“天下粮仓”的方向去破案。究竟如何，要看调查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过以过去的经验推断，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总有某种间接的联系。现在财政对粮食的补贴，到每户农民头上的还不算多，但总量已经不小。这对粮食总供求当然有影响。不补贴呢，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似乎都有麻烦是为两难。出路之一，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农地转让权。就是说，需要土地制度方面的进一步改革。延缓地权改革，只靠粮食补贴，财政能力是一个问题，补来的粮食压库，社会成本过大，管理负荷过重，怕是过不长久的。

还有吉林那把大火，工厂里面工人在干活，但车间门被反锁，着火了人也跑不出来，活活烧死！经济发展当然要支持民营经济，但民营企业也一定要保障工人权益。这些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不可能仅靠各方自觉就可以自动实现，要有政府来充当履行市场合约的第三方。可是平时管东管西、查这查那的很忙，偏偏人命关天的环节就没检查、没监督。说此案暴露“政府缺位”，总不冤枉吧？问题是缺位了怎么着？用什么机制来监管政府，使之不再缺位呢？

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样野蛮的办法。众目睽睽之下，身穿国家制服，跳脚猛踩小商户的脑袋这样的官民关系，离“官逼民反”不很远就是了。说是“临时工”所为，可事发整整七天之后，

延安城管局长才现身道歉。他到底忙什么去了？官员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如此官制不改，就不怕国将不国吗？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现在论改革，还不是摆开架势做最优的顶层设计，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正派生出更多的问题。我写过“接着石头过河”，就是挑战一个接一个飞过来，逼你出手招架。这是第一层次。

第二个层次，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

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就比过去更高。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解放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

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弥漫，那就无从动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个层面，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

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

看到这类现象，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人有法不依，没有遵纪守法得好习惯。这个问题存在。但有的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少的法，定的不合理。我举过一个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机落地时，广播里一定说请大家不要打开手机。可是前后左右，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可是搭乘香港国泰或港龙的班机，人家一落地就广播说现在可以打开手机了。我的问题是，要是落地之后开手机没啥不良后果，干嘛不痛痛快快地让大家开手机得了？这是说，有的情况下，改一改法或规章，不难做到有法必依。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过日子。

讲到这些现象，“小道理”盛行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改。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来源：企业家网）

麦肯锡：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五大方法

Jonathan House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简称 MGI）在其最新发布的《格局颠覆者：美国增长和复兴的五大机会》（Game Changers: Five Opportunities for U.S. Growth and Renewal）报告中称，美国经济面临的远不止是周期性问题，需要更深层的、结构性的变革才能大幅提高生产率并创造新工作岗位。

MGI 在周三发布的上述报告中表示，美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数十年来不断发酵，现在是时候将话题转到能够促进投资和就业的增长导向型政策上来了。

MGI 报告找出了五个刺激增长的因素，并对其可能的影响进行了量化。这五个因素是：蓬勃发展的页岩油气行业、贸易增长、基础设施投

资、数据分析的进步以及教育改革。报告称，虽然这五个方面都需要巨大的投资，但其成本可由各级政府以及私营领域分担。

1. 页岩油气；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可能产生的贡献：3,800 亿至 6,900 亿美元，约占 2020 年预期 GDP 的 3.7%。

新的钻探技术、高度完善的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开放的监管架构已经使得美国在页岩油气储备方面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因此在过去五年中，美国的天然气产量年增幅达 51%，石油产量年增幅达 25%。能源进口下降帮助美国缩小庞大的贸易逆差，减少了其对 GDP 的拖累。

对于石化、化肥和钢铁等能源密集型制造业而言，能源成本下降已经带来好处。进而服务

行业也广泛将从能源和制造行业的扩张中受益。据 MGI 估算, 要彻底利用好页岩油气机会, 美国将需要在新建管道、钻井平台及其他基础设施方面投资 1.2 万亿至 1.4 万亿美元。

2. 贸易增长; 对 GDP 可能产生的贡献: 2,000 亿美元至 5,900 亿美元。

MGI 称, 能源价格下降、技术革新以及美元走软有可能会促进美国的出口、并缩小该国的贸易逆差。MGI 称, 近年来美国已经在国际市场失去了出口阵地, 而这并非只发生在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 一些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商也备受折磨, 这是美国监管、教育和基础设施标准下降的后果。MGI 表示, 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企业领导人中, 普遍的观点是美国正在失去其竞争优势。

但 MGI 称, 在一些所谓知识密集型的制造领域存在好转迹象, 例如美国国内汽车行业的大规模投资和增产、面向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精密医疗设备销售激增、航空业大发展等。MGI 预计, 能源价格下降将使化工制造的成本降低, 而从基因测序到大数据再到纳米技术等科技的进步将带来新一代的创新产品。

3. 数据分析; 其对 GDP 可能产生的贡献: 1,550 亿至 3,250 亿美元。

数字时代的到来引发了数据的大爆炸, 人们从传感器、付款交易、GPS 定位仪等处接收到各式各样的数据讯息。MGI 称, 用于数据分析的新工具拥有创造巨大利润的潜力。在零售领域, 亚马逊公司 (Amazon) 已经使用数据来向客户推荐相关产品和服务、捆绑促销以及动态定价等等。不过 MGI 认为这是大材小用, 因为数据的应用还可以提高供应链、员工管理以及营销的效力。

制造业也可能受惠于研发、工厂维护、供应链管理领域的大量数据分析。另外, 医疗保健和公共服务也有望从中得益, 不过这些方面较难衡

量生产率的改善程度。

4. 基础投资; 可能产生的贡献: 短期内 2,700 亿至 3,200 亿美元, 长期或贡献 6,000 亿美元。

MGI 称, 多年来美国在公路、水道及机场等领域的投资不足, 致使美国公共设施破旧不堪, 落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这一危害已经渗透至美国各行业的方方面面。例如, 供应分销网络的不可靠迫使零售商只得保留更多库存, 推高了经营成本; 采矿、材料企业面临着日益沉重的运输费用; 据估计, 不畅通的高速公路在 2011 年令出行者承担了高达 1,200 亿美元的燃油、时间流失成本。

举例来说, 假若美国基础设施能跟德国看齐, 那么不论在短期还是长期, 美国经济都能够受到有力提振。MGI 称, 虽然未来数年中每年可能要斥资 1,500 亿 -1,800 亿美元来打造基建项目, 但是当前极低的借贷利率意味着绝好的投资机会。MGI 还指出, 联邦和地方政府可以探索新的融资途径, 比如公私合营、成立政府支持的基建银行等。

5. 教育改革; 对 GDP 可能产生的贡献: 短期内 1,650 亿至 2,650 亿美元, 长期内贡献 1.7 万亿美元。

MGI 称, 和基建情况类似, 美国的教育体系也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从而逐渐侵蚀了美国经济的生产力。该研究院 2011 年针对 2,000 家企业的调查发现, 有三分之二的受访雇主不能顺利物色到合适人选, 无论岗位的技能要求高还是低。

为了补救该缺陷, MGI 建议创造更有效的、有的放矢的训练项目, 提高两年制、四年制大学学生 (尤其是技术学科) 的学业完成率, 同时提升小学、中学的成绩水平。该机构指出, 应该针对美国教育工作者的老龄化现象来一次更新换代的大换血。MGI 还称, 是时候努力物色优秀教师了。

((来源:《华尔街日报》))

“克强经济学”更多的是强调改革和稳增长

国务院参事、南开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院长 夏 斌

新一届政府首份“中考成绩单”近日揭晓。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6%，其中二季度增速为7.5%，较一季度下滑0.2个百分点，显示中国经济仍在筑底之中。

如何看待当前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国经济是否会陷入新一轮新的危机？怎样才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如何标本兼治提振投资者信心，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助力？

“克强经济学”的内涵是很丰富的，不能片面和偏颇地去理解。“克强经济学”更多的是强调改革和稳增长。

如果危机爆发后，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一旦危机爆发，整个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大城市居民和中产阶层积累的财富可能严重打折，由此将直接冲击整个社会与政治的稳定。因此，分析当前经济形势不要为经济增速增加或减少0.5个百分点困住自己，而是要有底线思维，也就是要有危机思维。因为当前中国的经济，不整，迟早要出事；整狠了，马上就出事。

那么，如何防范市场预期的突然转向？当务之急是要稳住经济局势，首先不让整体泡沫破灭，同时大力整顿经济，真心实意地加快改革。建议具体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快改革，包括动用扩大财政赤字、外汇储备、国有资产以及“国退民进”等手段，扩大各类有效投资，加快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以进一步挖掘中国增长潜力；

二是严肃市场纪律，主动刺破一部分泡沫，该破产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坚决破产；三是破产的中小金融机构和地方融资平台产生的公共债务怎么办？可以借鉴1997年亚洲危机后中国政府关闭一批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农信社、互助基金会等机构的经验，在依法处理中讲究策略，分类处置，包括变卖一部分地方国有资产以偿还债务，最大可能地安排好对个人合法债务的救助政策，这样才能将整顿经济的负面影响尽可能降在最小的范围内，以保障整顿与改革的顺利进行，只有这样，才能慢慢引导市场预期向合理的方向转变。在具体的政策应对上，夏斌同时从金融政策、财政政策、投资政策、出口政策、消费政策、控通胀政策、房地产政策、就业政策、创新政策等九个领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要求标本兼治、长短结合，全面调动“体制内”、“体制外”各因素的积极性。

有外资机构把“克强经济学”归结为不出刺激政策、去杠杆、结构性改革三大核心要点。“克强经济学”的内涵是很丰富的，不能片面和偏颇地去理解。“克强经济学”更多的是强调改革和稳增长。通过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来稳增长，在适当收紧货币发行的同时，又强调尽可能地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用好财政资金。通过坚持市场导向机制，以逐步形成良好的社会预期。

(来源：《和讯财经》)

放弃投资是“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主张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 林毅夫

把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居民收入占比下降、货币超发、创新能力不足、污染、腐败等一系列问题都归结为投资惹的祸，因而认为我国应该放弃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改为以消费来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显然是一种头痛医脚、因噎废食、“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主张。

自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国内外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储蓄和投资太多、消费不足，由此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威胁到国际经济的稳定，主张中国转为采用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减少储蓄、投资和外贸盈余。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我国推出了4万亿元的宏观调控措施，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投资使我国避免了大规模的失业，在外部环境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经济迅速恢复增长。但是，和国外一样，国内经济学界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政府采取反周期的措施，认为我国应该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并借机进行结构性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11年初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加深了国内外对我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的批评，和可持续性的怀疑。

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根源在于美国的过度消费而不在于我国的储蓄、投资过多，这个观点我在去年从世界银行任满回国以后出版的《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重大国际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和经验证明，在此仅增加一点证据以供参考：我国进出口贸易盈余从200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7.6%的高点降为2012年的2.8%，这段时间我国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没减少，而且还从2007年的41.6%增加到2012年的48.1%，消费则从2007年的49.6%略微减少为2012年的49.2%，可见国际收支巨幅不平衡的原因不在于我国的“过度储蓄和投资”。

我国经济的增长率自2011年一季度以来节

节下滑，持续时间之长为改革开放以来所不曾有过，但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同一时期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形比我国还严重。例如，巴西的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7.5%，降为2011年的2.7%，2012年的0.9%；印度的增速则从2010年的9.0%，下滑为2011年的7.0%，2012年的5.3%。巴西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低于20%，而印度投资的占比也只比30%多一些，可见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不在于我国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

为何不管以投资作为增长主要动力或是以消费作为增长主要动力的新兴经济体，在同一时期都出现了增速下滑？原因有二：一是，欧洲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二次探底，美国的经济虽然有所回暖，但去年的增长率仅为2.2%，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今年的增长率估计也仅有2.0%，远低于过去经济复苏时7%~8%的增长率。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疲软，使得新兴经济体的对外出口增长锐减。二是，2008年以来的反周期刺激的项目已经完工或接近完工，国内投资需求下降。将因为周期性因素所造成的增速下降归咎于我国的增长模式，也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论断。

投资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确实长期居于高位，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则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接近三分之二降低到现在的不足50%，然而这是否就是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已经取得了33年的快速发展，但维持经济稳定、快速、可持续发展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仍是我国的首要任务。事实上投资比重的多寡关系着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绩效，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所领导的增长委员会的研究，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共有13个经济体取得了“维持25年或更长时间年均7%或更高增长率”的成绩，这13个经济体的五个共同特征之一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

在经济增长被称为奇迹的东亚经济体中，现在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居于首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2011 年新加坡的人均收入高达 60688 美元，比美国的 48112 美元高了 26%。日本则为 33668 美元，仅为新加坡的 55%。新加坡的储蓄率长期维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 50% 左右。日本的储蓄率则从 1990 年泡沫经济破灭前的 34% 降低到了 2011 年的 22%，但消费占比的增加并没有使日本经济走出泡沫经济破灭后 20 多年的困境，所以，最近安倍经济学的三个主要内容之一恰恰是增加政府的投资以启动经济的增长。

提高人民的消费和生活水平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短期间增加消费也能增加经济的增长，但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是投资而不是消费。其原因在于消费的持续增加以收入增长为前提，而后者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来源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两者都必须以投资为载体。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要靠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来降低交易费用，消除增长的瓶颈。没有投资，就不会有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增加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继续增加，就只能靠举债，越积越多，到还本付息时，危机就来了。

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国美国是这样，南欧国家也是这样。反之，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劳动生产率水平和经济效率提高，收入增长，到下期时，不仅投资可以增加，消费也同样可以增加。其实，2008~2012 年间，我国消费年均增长 9.2%，而 1978~2007 年间我国年均的消费增长则为 7.7%，也就是在我国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最受海内外非议的这段时间，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学者或许会关心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但居民追求的是消费的绝对水平和消费的增长。

对比印度和我国的发展绩效，最能说明在发展中国家以投资作为经济可持续增长动力机制的重要性。两国同属人口超过 10 亿的文明古国，二次大战以后先后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开始了自己国家现代化的努力。改革开放之初的 1979 年，按美元现价计算，我国的人均收入

为 182.3 美元，印度为 227.6 美元，比印度低了 20%；2011 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则增加到 5429.6 美元，印度才达 1458.5 美元，我国的人均收入为印度的 3.7 倍。这种发展绩效的反差显然和两国投资率的差异有关，我国的固定资产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比印度高 10 多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增长率在近些年有明显的提高，其固定资产的形成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长期低于 25%，增加到 2005 年以后的 30% 以上。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必然存在着各种体制机制不完善的结构性问题，尤其我国以双轨渐进的方式来推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种方式固然使我国的经济避免了苏联东欧休克疗法所带来的崩溃和长期停滞，并且在转轨过程中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双轨制所遗留下来的一些扭曲和干预，也导致了收入分配的恶化和寻租、腐败现象的屡禁不止。我国确实需要毫不动摇地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解决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建立现代化、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消除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源。我国的投资在如何避免潮涌现象、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等问题上也有许多可以改善的空间。

但是，把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居民收入占比下降、货币超发、创新能力不足、污染、腐败等一系列问题都归结为投资惹的祸，因而认为我国应该放弃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改为以消费来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显然是一种头痛医脚、因噎废食、“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主张。

当前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通过宏观微调和鼓励民间投资来启动需求，以稳定增速是完全必要的。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内城的基础设施）和环境改善等方面，还有许多经济和社会回报都很高的投资机会。这方面的投资既可在当前启动需求，消化过剩产能，提高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收入和消费；建成后还可提高生产率、增长的潜力和质量以及经济运行的效率。上述投资在我国仍将会是一个一举多得、有利当前和未来的措施。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中国经济增长不能靠消费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Carnegie Endowment) 高级研究员 黄育川

当前市场在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评估相关政策选择方面遇到了困难。一种极端表现是，部分观察人士开始讨论中国经济崩盘的可能。但绝大多数人已经转而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应该更多地依靠消费驱动，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失衡几乎已成共识——消费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中所占比重已经逐步滑至 35% 以下，为主要经济体中的最低水平，而投资占中国 GDP 的比重则升至 45% 以上，为主要经济体中比例最高的。

中国经济增长失衡常被归咎于利率水平偏低或者人民币汇率被低估。这是一种很方便的解释，因为价格驱动资源配置的观点很容易为金融市场所接受。但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上周发表于《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的文章，准确地找出了该问题的真正原因，这在主要评论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克鲁格曼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失衡可由阿瑟·刘易斯 (Arthur Lewis) 获得诺贝尔奖的模型来解释；该模型展示了伴随着投资的增长，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现代经济领域的转移，是如何导致经济快速但不平衡地增长的。该模型还展示了，在何种条件下，劳动力供给将趋紧，经济增长将放缓，中国经济也将最终更趋平衡——即达到“刘易斯拐点”——正如克鲁格曼指出，这一过程正在导致中国“撞上长城”。

但克鲁格曼接下来错误地指出，中国的城镇化连同工业化进程，“导致工资水平在经济走向富裕时仍然维持在低位”，中国为了避免经济增长严重放缓，必须尽快平衡经济增长。和很多其他人一样，克鲁格曼认为再平衡是中国避免经济增长过早放缓的解决办法。正是经济过早放缓导致了多数雄心勃勃的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较高的国民收入水平，这在拉丁美洲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一现象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事实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只有少数几个欧洲以外的经济体成功避开了中等收入陷阱，并且其中的绝大多数位于东亚——包括日本、韩国、台湾以及新加坡。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的是，这些经济体经历过长达数十年的不平衡增长，消费占 GDP 比重曾经下滑 20 至 30 个百分点，然后才实现较为平衡的增长——而目前中国所走的似乎正是这条发展道路。事实上，只有增长不平衡的经济体才成功地进入了高收入阶段，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增长势头缓慢的东南亚国家，走的才是较为平衡的增长路径。

为何成功的增长模式会如此失衡？答案在于结构调整，当一个经济体从依赖农业转向以城市工业和服务业为主，会发生这种调整。目前中国的城镇人口占比已经超过了 50%，而三十年前则仅为 20%。在小农领域，劳动力直接创造的产值比重约达 90%，而在工业或服务领域，劳动力直接贡献的产值比例则接近于 50%（其余部分来自其他生产要素投入）；随着每年数百万农民工从小农业流向工业和服务业，其对整体国民经济数据的影响是，劳动报酬在 GDP 中所占比重自动下滑，并导致消费占 GDP 之比随之下降。

与流行观点相反的是——克鲁格曼在这里同样犯了错误——城镇化进程并未对劳动力造成不利，消费占 GDP 比重下降也并无不妥之处，因为农民工所获报酬以及消费支出较进城之前多出了好几倍，企业也能通过吸收更多劳动力以及利润增长实现扩张，中国整体也从生产率的提高以及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中获益。

在同等的经济发展阶段，前述经济增长不平衡经济体的消费以及工资增速，要比走平衡增长之路的经济体快得多。特别是，在实际工资增幅达到两位数的带动下，中国的实际消费支出一直在以每年 8% 的速度稳步增长——过去十五年来

这在任何主要发展中或者发达经济体里都属最高水平。因此，较平衡的增长模式将带来工资以及消费支出更快增长这一假设，并不成立。

受增长失衡对经济不利、消费支出遭到抑制等观点的影响，很多评论家错误地建议，中国应该更多地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经济理论中并不存在消费驱动型增长的概念。可持续的增长只有通过增加生产要素——即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和提高生产率才能实现。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数量趋于下降（虽然劳动力质量尚有提升空间），投资率也已达上限（虽然投资结构一定会发生变化）。因此，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目前面临的挑战是，进一步推进旨在提高生产率的改革。

当前的风险在于，如果人为刺激消费以及

过早地平衡经济结构，中国可能失去提高生产率的机会，而这原本可以通过实施改革、推动城镇化进程更有效进行、允许私营部门发挥最大潜力来实现。韩国、日本和台湾是在人均收入达到12000至15000美元（按经调整的购买力平价衡量）时开始平衡经济结构的。如果中国政府施行必要的改革措施，实现生产率的提升，那么中国经济在2020年以前都不会像克鲁格曼所说的那样撞上长城。届时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稳稳地走上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道路。

如果中国政府的措施得当，那么经济结构再平衡最终将作为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副产品而发生，而不必将其当成一个核心目标。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美国政府为何不救底特律破产

中央电视台财经评论员 许一力

美国第五大城市，著名的“汽车之城”底特律递交破产保护申请，如果最终走上破产的道路，其149亿美元的长期债务和60亿美元的短期债务，将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破产案。

这几天有不少媒体聚焦在了政府的破产上，底特律的教训不是给我国地方政府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吗？什么叫政府的破产？破产之后政府还会存在么？

政府破产，这个在咱国人听来像天方夜谭的故事，实际上上演了很多次。尤其是这几年经济差，小到日本北海道夕张市，大到北欧国家冰岛的中央政府，都有过政府破产的悲剧，美国历史上政府申请破产更频繁。有个数据，从1980年以来，美国共有40多起地方政府宣布破产的案例，最近4年就有10件。最著名的算是09年左右的加州政府破产危机，主要是因为次贷危机，房地产泡沫破裂带来了地方债务违约风险加重，

地方财政收入下滑。

看来最近几年美国的地方政府的日子都比较惨淡，让人意想不到的，除了这次的底特律之外，或许还会有50-100个较大规模的地方政府接下来会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这个数据太可怕了，接下来奥巴马最大的难题也许就是这些地方政府的破产。

让很多人想不通的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会对这些破产置之不理呢？

美国的政府破产机制，不可避免的要与联邦制的国家体制相连接。联邦制的实质在于什么？在美国，县先于州出现，州又先于联邦成立。所以这个国家是自下而上构建的，早在结成联邦之前，北美的十三个州就已经有了各自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宪法，甚至有自己的军队。而联邦制建立之后，中央政府回收了一部分权力——比如军权、外交权以及大部分财权。但从本质上说，联邦制

国家，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是平级关系，根据宪法有各自管辖的范围互不干涉。这就是联邦制的实质。

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联邦制国家的地方政府是否破产是这个地方政府内部的事情，与州政府和中央政府都没有太大的关联。当然中央政府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为其债务兜底，更加没有权利让其他平级的地方政府对其施以援手。

有人说眼前的底特律破产，中央政府能否对其拨款救助呢？如果地方政府举债难还的事情发生在中国，上一级政府必定会给县政府提供财政支援。这正是中国所有地方政府从不担心会出现财政破产的主要原因。但是在美国这种联邦政府兜底的假定是否行得通呢？可能性几乎为零！

底特律寻求中央政府援助，在理论上讲是可以的，但这样的援助必须通过美国国会的批准，这就看起来有点天方夜谭的味道了。美国国会议员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各个选区，他们代表各个州甚至是不同党派的利益，不可能为了单独一个地区说话。这样的道理在州议会上同样适用，所以底特律的破产，只能是苦果自吞。

美国这种上级政府不干预下级政府破产的理念，当然也有着它自身的考虑。比如底特律，破产的根本原因是当局对财政管理不善。如果州政府对管理不善的后果给予救助，那就开创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其他的市政当局会因此而没有动力去加强自己的财政管理。这个做法给咱们的中国地方政府真有一定的启示。

美国政府的破产意味着什么呢？企业破产，意味着变卖资产，员工下岗，这家企业就不复存在了，那么政府破产是不是同样意味着这个地方就进入全面的瘫痪状态呢？当然也不是。

美国地方政府破产，指的只是政府财政丧失了清偿债务的能力，但，政府破产仅是财政的破产，而不是政府职能的破产。

政府破产和企业破产最大的不同在于，进入破产阶段的地方政府是有能力解决债务问题的。美国破产法的立法精神，以财政重组为主。在维持政府日常运转之余，主要的工作是以包括债务展期、免除一部分本息、对存量债务进行再融资

等手法进行债务重组和平衡预算。

美国政府破产，通常只会以政府的部门作为“痛下杀手”的目标，普通的公众，至少在经济方面不太会受到政府破产的影响。从美国一些著名的政府破产案例来看，当初橘县政府破产后，就硬着头皮解雇了2000名公务人员，以节省工资支出；纽约州政府则削减了20%的州立机构；纽约市市长关闭了20个消防站，并正在计划所有市政机构裁员。南达科他州曾将约100英里的沥青柏油路改变成了碎石路。从各种资料可以看出，美国地方政府在处理债务问题时，总是在自己身上寻求缩减开支。所以，在这种前提下，很多时候面临难以为继的地方政府，居民甚至是希望通过这些政府破产寻求地方经济的出路。

当然，政府破产肯定会对整体的经济发展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在这种前提下，美国宪法为什么会支持地方政府的破产机制呢？

我们是这么理解的，所谓的政府信用是以什么为基础的呢？市场眼中，政府的征税权是很好的信用保证，这使得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债券融资，并通过征税来偿还。所以，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么一个政府，如果拥有无限征收权，能够自行决定征不征税、征什么税、征多少税，那么破产是不可能的。但是，过度自由的政府，对于公众利益必然产生损害。美国的地方政府是有限政府，只有征收执行权，而至于征不征税、征什么税、征多少税则完全由议会、民众直接决定，那在自由市场冲击下的政府破产是有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破产反而是一道制度屏障，保护社会免受政府进一步侵害。

这样也好，可以让地方政府本身对如何花钱更加谨慎，政府不敢大幅举债建设，因为一旦破产，政府就会面临痛苦的结构性改革。这在牺牲了一定的经济活跃度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风险。

终归来说，美国的政府破产不能以常态来看，美国的地方政府可以破产的机制，有一定的先进性。反观我们国内的发展模式，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行为兜底，无限买单，这在很大程度上助涨了地方经济大跃进的格局。

从国家的特殊性和经济建设的需求来看，中国的集中制有着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独有的优势。而新任政府高层也在以更加凌厉的手段冲击原有的地方财政上的毫无节制。如果能在集中制的经

济规划优势和地方政府的举债模式之间找到平衡点，那么重新腾飞的中国经济，应该会有一个更加良性的增长模式和前景。

(来源：《凤凰博报》)



协会咨询专家陆雷作为首批上海市新社会阶层 人士代表到政府部门挂职锻炼

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 IT 专业委员会负责人陆雷近日被任命为奉贤区科委副主任。他是作为上海市首批新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到政府部门挂职锻炼的。陆雷是我会咨询专家，供职于协会的理事单位上海万隆国际咨询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总裁助理工作。他努力工作，无论是社会工作还是本职 IT 咨询工作，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协会工作中，作为 IT 咨询业的代表积极参加协会培训的教材编写工作。他发挥自己的特长，主持过几届上海市青年咨询论坛。他作为 70 后的代表，在社会工作和本职工作中经受了锻炼，成长起来。

7 月 30 日，奉贤区委举行了挂职干部见面会暨上海新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奉贤实践锻炼基地挂牌仪式。

会上，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沙海林强调，挂职干部要珍惜机会，要“做事不做客”，切实承担起各项任务和责任，大胆工作；要转换角色，处理好主角与配角的关系，为政府工作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对于此次一共三人进入奉贤区政府部门的挂职干部，上海奉贤区委书记周平表示，“挂职干部不能因为挂职时间短就被束缚手脚，要敢于破解难题。”他希望新社会阶层人士“成为奉贤干部队伍建设中的鲑鱼”，激活整个干部队伍。

在挂职工作座谈会上陆雷表示：自己来挂职，就是来合作、支持、服务的。十几年来自己一直从事 IT 审计工作，专业上的事我可以做，有些事我可以充分做，比如将我熟悉的外部资源引入奉贤。一年的时间不长，但我希望能有机会为奉贤带来些 IT 行业里说的“微创新”。

据介绍，选拔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到政府部门挂职锻炼，“主要出于培养人才的考虑，同时也为了适应奉贤区‘求贤若渴’的客观需求。”此举旨在团结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他们提供在基层一线工作经历的平台，增进其对政府工作的了解和理解，帮助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合作共事能力。他们都将作为上海新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在奉贤区政府部门的领导岗位上开始为期一年的锻炼。

新社会阶层是指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他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此次挂职的奉贤实践锻炼基地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特别是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采用项目式挂职的形式运作。挂职期间，挂职干

部一般每周在挂职单位工作不少于3个工作日，同时，要求严格遵守《公务员法》和各项廉政纪律，自觉接受组织、集体和他人的监督，保持良好的工作和生活作风。

首批挂职的厉明、邵楠和陆雷，分别是法律、金融、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专业人士，政府部门针对他们的工作经历、专长，征求本人意见，结合以往体制内挂职的经验设计，最终确定他们分别担任奉贤区司法局、发展改革委、科委的行政副职。按计划，今后将每年选派3名左右新阶层代表人士到基地挂职半年至1年。



图为奉贤区会议中心，挂职干部厉明（左）、陆雷和邵楠（右）会后交流。

（来源：唐勇摘编自《人民日报》）

· 聚焦中国 ·

中国建筑资产总值全球第二

最新研究发现，中国在建筑资产方面是第二富有的国家，并将于明年超过美国。去年中国建筑资产价值35.45万亿美元，在首次公布的全球建筑资产财富指数中排名第二，仅位于资产价值39.73万亿美元的美国之下。上述指数衡量一个国家的财富使用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而是其建筑资产的总价值，包括公共和私有房产，住宅及商用基础设施，公路、铁路和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发电站及供水网络。

该指数是由克力思咨询有限公司对30个国家和城市进行调查后得出的，香港以1.03万亿美元建筑资产排名第24位。日本和印度分列第三和第四位，新加坡排在第27位。前10个最富有的国家中，4个来自亚洲，包括排在第八位的韩国。

该报告称：“建筑资产水平高的国家更有可能获得较高水平的经济产值，因此收入水平也会更高，这能体现全球经济实力的分配。”报告

发现，2012年中国建筑资产约相当于GDP的286%，而国际平均水平是284%。报告预计，以建筑资产计，中国将于明年超越美国成为最富裕的国家。预计到2022年，中国将积累价值75.7万亿美元的建筑资产，比美国和印度加起来的数额都大。

去年这30个国家和城市的建筑资产总价值约为193万亿美元，是同年这些国家和城市68万亿美元GDP总和的近3倍。

新加坡人均建筑资产价值约为15.6万美元，使其成为人均最富裕的国家。香港人均14万美元，名列第五。中国人均建筑资产2.6万美元，排名第24，大大低于美国的人均12.6万美元。

报告称：“尽管新兴市场增长迅速，其人均建筑资产依然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到2022年中国人均建筑资产仍将比美国少61%。”

（来源：《参考消息》）

上海明确深化改革开放三大工作重点

(一) 试点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着力把握好三点:

第一, 试点建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具有国际水准, 成为我国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这是自浦东开发开放以来, 中央交给上海的又一重大使命, 对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至关重要。要把试验区建设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改革任务, 齐心协力, 扎扎实实, 落实好这一国家战略。第二, 试验区建设的重点是制度创新, 不是政策优惠, 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要求, 尽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第三, 把试验区正式启动时必须具备的一整套法律法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准备好。

(二) 转变政府职能。重点做三件事:

第一,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第二, 优化

部门职责体系。重点解决: 职能越位、职能缺位、职能错位问题。第三, 继续深化创新政府服务与管理方式。强调市场化, 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强调社会化, 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和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强调信息化, 上海做了很多尝试, 如网格化管理、交通综合信息平台、网上政务大厅、“12345”市民服务热线、政务微博等。

(三) 深化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一是开展广播影视行业“营改增”试点确保扩围平稳运行; 二是完善先行试点行业改革政策, 有效降低试点企业特别是交通运输企业的税负; 三是提升与全国“营改增”扩围的联动效应, 促进“两头在沪、中间在外”企业集聚发展; 四是研究其他行业实行“营改增”试点的可行性, 积极配合国家有关部门, 研究制定将邮电通信行业择机纳入试点范围的实施方案。

(来源:《东方早报》)

勘 误

尊敬的会员单位及读者:

2013年第7期《上海咨询信息》有两处勘误如下:

1、题目为“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和会长副会长名单公告”里的序列号7, 正确的表述应该是: 上海投资咨询公司 王融融 总经理助理

2、题目为“《建设项目造价费用》首发式圆满举行”里的第一自然段, 正确的表述应该是:

6月20日,《建设项目造价费用》首发式在黄浦江畔的小陆家嘴滨江大道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一楼大厅举行。原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会长周禹鹏主持首发式。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工作党委书记许德明作重要讲话。

本刊为给各位读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上海咨询信息》编辑部

美国纽约港自由贸易区 21 条优惠政策

美国有 250 个自由贸易区，纽约港自由贸易区是美国最大的自贸区之一，该自贸区设置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

1. 推迟缴纳进口关税

运进自贸区的货物不需要立即缴纳进口关税。只有当货物通过海关运入美国时才需要支付关税，有利于企业的现金管理。

2. 倒置关税税率节省关自税

通过在自贸区设厂，企业可以自由选择支付原料的税率还是成品的税率，由此可以选择其中税率低的支付。

3. 无关税出口

企业在自贸区设厂可以不需要支付任何进出口关税实现出口。

4. 节省为废品支付的关

企业如果不在自贸区设厂，进口原料中的废品以及生产过程中浪费的原料也需要支付进口关税。

5. 国际退货

自贸区产品出口海外，如果遇到退货，不需要为退回的货物支付进口关税。

6. 进口备件

企业可以在自贸区仓库储存目前不需要的进口备件。如果最终不需要该备件可以免关税的退回或者销毁。

7. 简化进出口程序

在自贸区永远不用担心过海关造成的延误，或者进出口税务问题造成物品被查扣。从自贸区出发，货物送达更加便捷。

8. 无需为人力和行政开支付税

在自贸区生产的产品运入美国海关时，进口价格中由于人力成本，行政开销和企业利润的那

部分不需要缴纳进口税。

9. 质量监控

企业可以先免关税进口商品进入自贸区，经过质检合格后再支付进口税通过海关进入美国。不合格的产品可以免税退回或者销毁。

10. 自贸区之间运输

很多企业需要在不同的自贸区间转移货物，这都是免关税的。只有最终通关进入美国的时候才需要支付关税。

11. 节省货物处理费

自贸区的货物可以 24 小时无限制地通过海关。企业只需要每周申报一次过关记录和缴纳一次货物处理费。每个企业每周需要缴纳的货物处理费最多为 485 美元。如果在自贸区外的企业每次进口都需要申报，那么需要支付货物处理费。货物处理费也没有上限。

12. 美国进口配额

需要美国配额的商品可以先存在自贸区，不受到配额的限制。一旦配额开放，商品就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海关运入美国。

13. 安全

自由贸易区是受海关监督，提供海关要求的安检程序。自贸区内部的企业可以不必花费保险和保安的开支。

14. 港口维护费

自贸区的企业根据运入自贸区的货物数量按季支付港口维护费，而不需每次进口都支付。

15. 库存控制

在保税区经营的企业需要执行严格的财务制度，保持接收、处理和发货等各环节的单据。通过这样严格的制度，有效地减少企业错误发送货物的可能。

16. 消耗的商品

在保税区加工消耗的商品一般是不缴纳关税的。

17. 库存占用税 (Inventory Tax)

美国大多数州和县税务机关免除自贸区所有货物的库存占用税。因为根据联邦法律,为出口而设立的特别区域生产的产品或者是个人使用的进口有形资产免除从价税(ad valorem tax)。

18. 展览商品

许多公司利用自由贸易区作为商品和机械的展示区,因为把展品从海外运进自贸区不需要进口关税。

19. 减少保险费用

自贸区内商品的投保价值不需要包括应缴进口税额的部分。所以为在自贸区内商品购买保险的时候,投保额度可以少一些,保险费用也要少一些。

20. 原产地标记

进入自贸区的商品不需要拥有原产地标记,可以为企业节省复杂的手续和开销。如果需要,企业可以在自贸区内为商品加上原产地标签。

21. 转让商品的所有权

在自贸区内,只要没有零售销售,商品可以自由买卖。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 政策解读 ·

“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解读

政策要点:

市政府设立的“上海市自主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重大项目专项资金”更名为“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

支持范围: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支持范围符合《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技术指导目录》及相关专项工程指南,并可按本市有关规定用于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技术含量高、应用前景好、示范带动作用强、处于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项目、产业科技攻关项目、示范应用项目、公共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等。这些项目按其性质、投资规模,分为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配套项目等。

政策依据: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批转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制订的《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高技术服务业专项工程实施管理细则》的通知。

详细信息:

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高技术服务业专项工程实施管理细则。

第一条 (目的依据)

为推动上海国家高技术服务业产业基地建设,促进高技术服务业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的指导意见》、《上海市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意见》及《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上海市实施高技术服务业专项工程(以下简称“专项工程”)。为规范专项工程实施管理,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资金来源)

专项工程支持资金在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

第三条 (支持范围)

专项工程支持项目按《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重点项目进行管理,项目总投资原则上不高于8000万元。对于总投资高于(含)8000万元的申报项目,由市发展改革委受理后转报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办公室”),按《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重大项目进行管理。

专项工程支持范围主要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研发设计和信息技术服务类项目,行业主管部门为市经信委;检验检测服务类项目,行业主管部门为市质监局;知识产权服务类项目,行业主管部门为市知识产权局;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类项目,行业主管部门为市科委;以及面向上述领域,针对产业环境优化和关键瓶颈突破的公共服务平台类项目、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应用示范类项目、以及本市高技术服务业产业园区和重点培育园区服务条件建设项目;具体由市发展改革委同市财政局制定的专项工程申报指南规定。

第四条 (支持条件)

申请专项工程的项目应符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有关条件,且具有明显的引领带动作用。

对于建设地位于上海国家高技术服务业产业园区及重点培育园区的项目,项目所在区县政府承诺予以配套资金支持的项目,以及国家、上海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参股设立的创投基金支持的项目予以优先支持;对于已获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但未完成项目验收工作的项目承担单位,以及本市其它专项资金已支持的项目,和按规定和惯例应由建设财力投资建设的项目,原则上不再支持。

第五条 (支持方式和标准)

专项工程采取补助、贷款贴息、或其组合方式支持项目。单个项目资金支持比例一般不超过项目新增总投资额的10%;公共服务平台、应用示范和园区服务条件建设类项目,支持比例一般不超过新增投资的30%,且支持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采取贷款贴息支持方式的,贴息资金总额根据项目贷款额度及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法定基准利率确定,每个项目的贴息期限最高不超过2年。

第六条 (预算与指南管理)

市发展改革委联合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在每年9月底前编制下一年度项目资金需求预算,拟定专项工程实施计划和申报指南,会同市财政局提交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

第七条 (项目受理)

市发展改革委根据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的实施计划和申报指南,向社会公开征集项目,分批组织项目申报工作,原则上年度组织项目申报批次不少于2批,当年最后批次项目申报工作应在9月底前结束。项目申报受理方式包括:

1、区县发展改革委按照专项工程指南要求,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受理和初审,并向市发展改革委汇总转报项目资金申请报告,并抄报相应市级行业主管部门;

2、市政府派出的管理机构、市级以上工业园区管理机构、市属企业集团、高技术服务业产业园区和重点培育园区管理机构、经本市主管部门备案的创业投资机构、市级相关部门,可直接向市发展改革委推荐并转报项目申请,同时抄报相应市级行业主管部门。

第八条 (项目审核)

市发展改革委委托有相关领域甲级咨询资质的咨询机构开展评估,受托咨询机构独立开展项目评估工作,并通知相关市级行业主管部门派员参与评估工作。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财政局研究提出专项工程项目建议支持方案,提交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

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后上报市政府审定专项工程项目建议支持方案。审定方案在市发展改革委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后,若无异议,由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批复。市发展改革部门根据批复意见,批复项目资金申请报告。

第九条 (协议管理)

获得专项工程支持的项目实行协议管理。市发展改革委与项目单位签订项目实施框架协议。协议内容包括:项目名称、承担主体、项目实施期限、建设内容和目标、专项资金支持方式和数额、违约责任、双方约定的其他条款等。协议文本格式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制定。

第十条 (跟踪评估)

项目单位按照实施框架协议的有关规定和项目进展情况,向市发展改革委提出中期或后评估申请,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财政局委托具有相关领域甲级资质的咨询机构开展中期评估或后评估工作,通知相关市级行业主管部门派员参与,并在评估报告基础上,形成项目验收意见。

市发展改革委跟踪项目实施推进情况,在每年12月初,编制专项工程实施情况年度工作报告,并报送领导小组办公室,抄送产业化推进工作小组和科技创新推进工作小组。

第十一条 (项目调整)

获得专项工程支持的项目,不得擅自改变主要建设内容、建设目标、验收标准等。在执行过程中因特殊原因确需调整、延期、撤销的,由项目单位向市发展改革委提出书面申请,市发展改革委征求相关市级行业主管部门意见,会同市财政局按照有关规定,审核同意后进行调整、延期或撤销,并将审核意见抄报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十二条 (资金拨付)

对于已按程序批复的项目,市财政局根据市发展改革委提交的请款报告,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财政支付管理的有关规定,将专项资金直接拨付到项目单位。

资金拨付方式为:市发展改革委批复项目并签订实施框架协议后,先行拨付核定支持资金的40%;中期评估通过后拨付核定支持资金的40%;后评估通过后根据完成情况,拨付不超过核定支持资金的20%。原则上项目法人的自筹资金应同比例到位。用于贷款贴息的支持资金拨付具体按照实施框架协议有关约定执行。

第十三条 (使用监督)

专项工程支持资金重点用于项目建设相关的设备购置等支出以及符合国家规定的研发费用支出。市审计、监察等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对专项工程支持资金使用情况 and 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向领导小组办公室反馈。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可视情对专项工程支持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专项审计。市财政局会同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对专项工程支持资金进行绩效评价。

第十四条 (违规处理)

申报企业如被发现提供虚假资料,收回已拨付的专项工程支持资金,并取消项目法人三年内继续申报项目的资格。获得投资补助的企业收到财政补助拨款后,要严格专款专用,严禁挪用挤占。违反规定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 第427号)进行处罚,追回专项工程支持资金,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五条 (附则)

专项工程项目评估程序、标准等按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评估管理办法执行。

本细则规定的专项工程项目评估、审计经费在专项资金预算中列支。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来源:《上海科技网》)